

对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哲学沉思*

张艳涛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世界怎么了? 世界向何处去? 面对“世界之问”, 哲学家和哲学智慧不能缺场。对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哲学沉思, 恰逢其时。“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是人类永恒的哲学命题。和平与发展作为人类永恒的主题,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和人民都无一例外。实现人类和平与发展一直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和共同理想。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的动荡变革期, 这种价值追求和共同理想更为迫切。世界潮流, 浩浩荡荡, 顺之则昌, 逆之则亡。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类要掌握自身的命运关键是实现人性变革, 即从“小我”走向“大我”、从“我”走向“我们”,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毕竟, 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前提。中国是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我们遵循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践行“对话的文明”, 倡导各国应在和平与发展中谋求“强国之道”和“共处之道”。

引言 世界向何处去?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各国各地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 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同时,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 世界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和平还是战争? 发展还是衰退? 开放还是封闭? 合作还是对抗? 表面上看是‘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 实质上是基于当前世界动荡和风险的理性思考。”^①在 21 世纪, 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主题。当今世界, 只有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路才能走得通, 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 就不能身体已进入 21 世纪, 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 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 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阵营对立的老框架内。“当前, 人类正处在‘文明范式转换’即创造一种新文明的历史进程之中。”^②中国人民热爱和平, 坚定走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哲学研究”(批准号: 23&ZD033)的研究成果。

① 张艳涛、陈惠莲:《论系统性风险世界: 形成根源、表现形式及中国应对》,《吉首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

②《人类共生与世界市民教育: 第 11 届池田大作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创价大学 2023 年版, 第 279 页。

平发展和文明发展之路，这既是 21 世纪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根据时代发展潮流与基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这一道路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特征，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及合理走向的新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推动从“竞争式发展”走向“竞合式发展”，从“零和博弈”走向“共赢共生”，这才是人间正道。针对和平赤字，中国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针对发展赤字，中国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全球发展倡议；针对安全赤字，中国从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出发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针对治理赤字，中国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实际上蕴含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而注重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普惠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1985 年 3 月 4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的谈话中围绕“和平”与“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1987 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一科学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指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所作出的“战略抉择”，又是中国对国际社会所作出的“庄严承诺”，从而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仔细分析，在池田大作先生的思想体系中“和平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世界走向和平、进步、幸福起了巨大作用。反对战争，坚持世界和平；珍爱生命，主张以人为本；奋进开拓，推进中日友好。这些深邃的和平思想为人类和平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①其实，越是对立、纷争、冲突不断，人们就越是渴望和追求和平，也越是深掘发展的真意。当今人类面临的所有重大现实问题似乎都与对于和平和发展的理解相关，更与实现和平与发展理念的方式相关。近年来，在国家及地区间对立、纷争、冲突不断，在可持续的、和谐的发展受到挑战的世界局势下，文化间、文明间、人与人、人与自然甚至人与自我之间等不同层面的对话愈发迫在眉睫。当前人类社会虽已走出“冷战”的桎梏，但“新冷战”的阴霾挥之不去；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但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沉渣泛起；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推进，但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仍在不断侵蚀和平发展的根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势不可挡，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依然任重道远。特别是在局部地区冲突迭起的紧张

① 覃启勋：《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 年第 6 期。

局势下，在“积极的和平”状态离人们十分遥远的语境下，亟待对和平与发展问题展开更进一步的哲学思考，用哲学思想之光照亮人类前程。

一、哲学之眼：研究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哲学视角

研究和平与发展问题，关键是具有“哲学之眼”。通过“哲学之眼”，我们看到，和平与发展原则不仅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国际关系伦理的基本原则。和平与发展问题具有深厚的哲学意蕴。和平原则的哲学意蕴，主要表现在尊崇人的生命价值的前提下对“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的深刻认知；发展原则的哲学意蕴，主要表现在对尊崇以人为本人的前提下对“没有发展就没有繁荣”的深刻认知。

（一）西方文明视角下的和平与发展问题

西方国家开创了现代历史，西方文明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基本底色。总的看来，西方文明是服膺西方国家的根本利益、服从资本增殖扩张逻辑的文明形态，它具有三大基因缺陷，一是“西方中心论”所蕴含的对抗性基因；二是由自由主义所蕴含的利己性基因；三是资本主导的逻辑所蕴含的扩张性基因。这三大基因缺陷使得由西方文明构筑起来的世界文明秩序、文明规则与人类社会追求和平与发展、公平与正义的旨趣严重背离，成为导致风险和动荡的深层动因。仔细分析，现代文明危机主要源于人性的迷失。“自由主义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这是导致世界困局的人性根源。”^①近代以来，整个世界的发展主要是以西方文明为主导，其哲学理念和哲学思维是以一元论、“主客二分”、资本主导为核心内容的“西方中心论”。诚然，西方文明推动了世界发展，但也蕴含着“对抗”、“利己”、“物欲横流”、“掠夺扩张”的基因，这是造成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深层动因。

西方文明的发展离不开西方哲学。近代西方哲学对战争与和平的论述，直接关系到西方世界看待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态度。康德主张“永久和平”，他由个体间的契约推及至国家间的契约，提出通过建立“各民族的联盟”来实现永久和平的设想。康德认为人作为有理性的生物希望形成普遍有效的意志而在群体中得以自由的生活，他以人的理性作为建立联盟的普遍基础，主张以形成一种国家共同体来实现世界的和平。黑格尔与康德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在康德的国际联盟组织构想下各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将失去发展的潜力，历史将失去辩证发展的力量，最终只会陷入大一统的局面。黑格尔认为，战争是人类族群净化道德、发展自由的必要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哲学等需要采取国家武力来保护并得以深化和发展，在

^① 韩庆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410页。

获得提升之后，再以其凝聚形成的民族精神回转过来影响这个国家的力量，扩大它的自由。

尽管康德和黑格尔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表现出对立倾向，但他们作为西方哲学家都对人的主体性持肯定态度，希望通过肯定人的理性主体或意志主体为人类确立一个新的目标，从而彻底解决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在此哲学观点影响下，近代西方国家虽然实行了建立国会、成立国际联盟、签订战后协议等努力争取地区和平的举措，但同时也没有舍弃传统“以武夺权”的行为本色，在国际条约中不断抢占话语掌控权，将战争合法化。二十世纪后半叶冷战爆发，此时的战争有了完全不同的质与量，战争或和平已经关系着人类整体的存亡。总之，西方文明视角下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离不开西方哲学中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鲜明色彩，西方世界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前提是确保自身的价值观、利益与规则处于稳固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打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二）中华文明视角下的和平与发展问题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在中华文明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睦邻友邦”“天下太平”等理念世代相传，中华儿女在和平中共生存、在和平中谋发展。“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和平性，是以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作为哲学依据，以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为基础的，因此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是建立在中国哲学深厚的基础之上的。”^①中国哲学主张宇宙就是阴阳变化的一个和谐的整体，人类社会应当认识到自然的规律性，人在发挥积极主动性的同时也顺应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性与天道的一致性，最终实现“太和”“仇必和而解”的理想状态。天之道，不争而善胜。老子从无知无欲出发，不主张由求知所导致的人违背自然的歪曲路径，反对战争，倡导在自然状态下万物的和谐共生，体现出中国哲学鲜明的和合特色。

中国古语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人始终认为“天下”并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个别民族的天，而是所有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天，展现出希望所有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守望相助的愿望和理想。在世界历史上，中国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却从未殖民和侵略他国。《左传》中讲“止戈为武”，意思是说止息兵戈才是武功，能止战才是真正的武功。“武”的真谛是消除战争、安定百姓。《孙子兵法》开篇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主张慎战不战。中国人很早就懂得和平对文明的保障作用，也深知战争对文明的破坏作用。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信奉丛林法则，以强欺弱、穷兵黩武，必将走向灭亡。几千年来，和平性已经深深烙在中华文

^① 刘丰：《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思想特点及其当代呈现》，《哲学研究》2024年第5期。

明的特质里，刻进中华儿女的基因里，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能够站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思考人类的前途命运问题，坚持和平为先、共同发展，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三）不同文明视角下看待和平与发展问题造成分歧原因之所在

如今人类已进入命运与共的时代，然而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道路、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经历多边和单边、开放和封闭、合作和对抗的重大考验。中西方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在看待和平与发展问题与实施的政策方针上不可避免地出现相悖的结果，造成分歧。总的看来，西方世界着重于作为主体的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进步，不论是战争状态还是和平状态，最终都要有益于人的利益，抑或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以此来稳固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在中华文明视角下，“天下大同”的治世之道倡导人们超越个体、休戚与共，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各国共享发展成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在寻求一种不同于“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发展之路，是在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就此而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一种“新世界观”、“新发展观”、“新治理观”和“新文明观”。作为对历史唯物主义原创性贡献的“中国方案”之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哲学关切，其强大的思想和理论穿透力直达历史深处，其逐渐推进预示着世界历史将进入新阶段。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同处一个地球村，面对不同的思想传统碰撞出的分歧，如何处理和平与发展，确保人类永续发展和世界持续繁荣已经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为此需要回归问题本质，探究解决之道。今天，要解决人类问题，就要揭示和平与发展的人性基础，寻求共生之路。这条道路的哲学理念和哲学思维，强调世界是多样的，国家是平等的，文明是互鉴的，相互是包容的，结果是普惠的。

二、哲学之理：挖掘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哲学根据

挖掘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哲学根据关键是掌握“哲学之理”。通过“哲学之理”，我们深刻认识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但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多极化趋势没有变，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任重道远；经济全球化趋势没有变，但遭遇波折和逆流；文明交流互鉴大势没有变，但“西方中心主义”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威胁加大。

（一）和平与发展问题蕴含的哲学本质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主义理论里讲的“和平”，主要指的是阶级斗争的消失或

缓和。阶级斗争消失的无阶级社会（原始氏族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绝对和平”的社会，也是马克思主义极力赞美或孜孜追求的理想社会。阶级斗争缓和的阶级社会是人类“相对和平”的社会。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与和平的主体是阶级和国家，造成这些不同阶级和国家之间斗争与和平的原因是它们相互之间不同的利益关系。所以，和平既是一种不以任何阶级和国家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社会关系状态，也是阶级和国家主观意志的价值体系 and 行为手段，即对任何阶级和国家来说，当客观社会状态更有利于其维护自身的利益和运转社会关系时，争取和平就成为这些阶级和国家的目标追求和行为手段。

“和平”与“发展”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矛盾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和平的虚假性与暂时性，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社会的“绝对和平”，因为共产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分配制度，消灭了阶级，国家也逐渐消亡，从而消除了战争的根源。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一切社会，都是阶级斗争的社会，从根本上说没有和平可言，只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绝对的和平社会，是完全实现和平价值的社会。所以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的最高价值取向。

（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来源

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等形势的总体研判，发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基因，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土壤。

世界观是“总开关”，越是在世界力量转移加速期和世界秩序建构的关键期，越要重视世界观问题的学理研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蕴含着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大同理想。“大同世界”体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世界观、天下观，是中国人民对理想世界形态的共同期盼。“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中国人崇尚“与邻为善”，期盼共同发展。“协和万邦”理念常见于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实践的各个方面，蕴含着中国人民对国家关系的理解。“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的内在特质。“以和为贵”“和合”理念是我们的行动指南，表示尊重不同的思想观念、文化特点和国家制度，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理念，坚持独立自主，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中华民族所追求的不是“整齐划一”，而是“共生共存”。这些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对和平发展的认识。近代中国经历过落后挨打、战火漫天、主权旁落、欺凌羞辱的灰暗时刻，没有谁比中国人民更加企盼偃武息戈、天下太平。这段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使我们更加珍惜和平。中国人民对和平与稳定有着深厚的情感，他们生怕陷入动荡不安之中，渴望生活能够在安宁祥和稳步前行。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起到的历史

进步作用。然而，世界历史的发展道路并不只有资本主义“单线性”发展模式，而是由于各国生产力发展状况、各国历史文化传统、时代的不断发展而各不相同的“多线性”发展模式。马克思早期认为所有国家只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才能到达世界历史，并提出“五种社会形态说”。但随着对东方社会的了解和研究，马克思逐步抛弃“单线性”的思维模式，提出了世界历史除了按照“五种社会形态说”依次递进发展之外，还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东方落后国家遭受西方殖民掠夺和军事侵略的悲惨命运之根源就在于资产阶级的逐利本性。东方落后国家人民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十月革命的胜利——既是实现国家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打破了资本主义的民族压迫，更在于揭示了推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有第二条道路选择。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以马克思世界历史“多线论”为理论依据，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和平与发展问题最终的价值旨归

追求和平乃至永久和平是人类永恒的理想和愿望。和平状态承载着人类的价值旨归，就在于和平是人类社会繁荣兴盛的前提。没有和平，人类就会陷入霍布斯所想象的丛林般的自然状态。几千年前，中国古代的贤哲就提出“协和万邦”的和平理念，近代以来包括康德在内的思想家也提出了“永久和平”的理念。“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①中国由“大国”迈向“强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的历史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合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劫难与洗礼。历史已经证明，走剥削扩张的血腥道路不能带来永久的安宁，只有走和平发展的文明道路才能造福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才能实现合作共赢。随着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国际力量发生深刻调整，全球经济社会加速重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世界和平的力量正在不断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当代世界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和世界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

三、哲学之道：破解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哲学方法

破解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哲学方法关键在于掌握“哲学之道”。“哲学之道”在于，抓本质、讲逻辑、善概括、重辩证、讲理性、谋战略。通过“哲学之道”，我们深刻认识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为此要以对话消除对抗、以交友化解交恶、以共赢取代零和。

^①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4页。

（一）以对话消除对抗

和平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一，实现和平的根本途径是促进文明对话，以对话来消除对抗。

“对话”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东西方思想产生并得以流传的最基本形态都来自于此，前者以记录孔子与其弟子谈话而成的《论语》为楷模，后者以柏拉图所记其师苏格拉底与他人对话为主要内容的《对话录》为范例。对话作为一种较为轻松随意的交流方式，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在推心置腹中消解紧张对立，建立坦荡真诚。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就是池田大作的“对话主义哲学”。在池田大作的一生中，总共访问过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前后与上千人举行过会谈，对话主题涉及和平、文化、教育、宗教、环境、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天文历法等诸多方面，由此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对话主义”的和平文化哲学。该哲学形态，以“对话”为基本形式，以加深彼此的了解、沟通和理解，并借此终结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与不和谐的状态，以实现世界和平和人类福祉为其终极目标。“因此充满哲学思考的池田先生似更应该被视为一位思想独特的哲学家才是；他出版的各类著作包括对话录，与其说是宗教作品，不如说是哲学著作更符合实际。”^①

1968年9月，池田大作先生提出中日交流史、中日关系史上著名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及后来《中日友好条约》的签订。池田大作始终致力于两国友好和教育、文化交流，为中日友好及世界和平作出巨大贡献。“池田大作的和平观是倡导人类和平的思想资源。”^②从2005年起，“池田大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先后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中国十所高校及创价大学成功举办了11届，极大深化和拓展了中日对话的基础。“对话不论是在个人之间还是国家之间进行，都会给社会带来和平和稳定的‘康庄大道’……要避免走进这条死胡同，我认为只有进行推心置腹的、坦率而富有勇气的对话。”^③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该在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争议、化解矛盾、缩小分歧、扩大共识。人类和平关乎人类命运，和平需要保卫，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二）以交友化解交恶

如何避免“新冷战”的威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各国如何相处、

① 韩东育：《寻找池田哲学的原点：以两部对话录为核心》，《哲学研究》2009年第1期。

② 王荣华、马场善久主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与实践：第十届池田大作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21年版，第90页。

③ 池田大作：《和平、人生与哲学：池田大作与基辛格对谈集》，卞立强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构建怎样的国际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领域的重大课题。中国给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中国方案，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在相互交融的地球村中进一步扩大朋友圈，在国际范围内广交朋友，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理解者、同路人。要实现真正的世界和平，就不应当承认战争是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池田大作的和平思想虽根源于佛教教义，但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①池田大作认为，“共生”是一种合乎理性的生活方式，“不是自我中心，而是以对方的心为中心，不是以‘我’，而是以‘我们’为基调，共同生存，互相支持，共同繁荣——这种共生的生活态度，应当成为 21 世纪的时代精神。”^②中国发展并不断深化全球伙伴关系，不仅为中国发展创造了良好国际环境，也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今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利益交融前所未有，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无论是推动发展还是应对挑战，单靠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的力量都无法实现，合作是正确之道。

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合作，是人的本质的展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③人民友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础力量，是实现合作共赢的基本前提，相互信任、平等相待是开展合作、实现互利互惠的先决条件。要实现和平，不仅要重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还要使人民和人民紧密联结在一起，因为“国家关系”说到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民间外交”在人民相互交往的基础上，增强不同国家间人民的跨国友谊，促进各国人民相亲相知，推动国家间相互交流与合作，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总之，民间友好是相互理解和共促发展的基础，积极通过民间外交促国家之间的民心互通、友好交往与互信互助，守护地区和平与安全，为合作共赢打下坚实基础，推动国际社会走向和平。

（三）以共赢取代零和

如何减少全球暴力与冲突、实现世界和平与永续发展一直是重大现实问题。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7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需要的不是制造分裂的鸿沟，而是架起沟通的桥梁；不是升起对抗的铁幕，而是铺就合作的坦途。”^④对立统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随着世界文明发展走向更高阶段，合作共赢正逐渐取代零和博弈成为国家利益矛盾处理的最优方法。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适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强者为王”的生存逻辑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国家的优势并不

① 黄顺力：《池田大作的和平思想与孔墨学说》，《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6 期。

② [日]池田大作、[美]杜维明：《对话的文明：谈和平的希望哲学》，卞立强、张彩虹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6 页。

③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 1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2 页。

④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7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8 页。

会永远偏向一方,强势国家经过博弈的消耗可能变弱,弱势国家的联合也可能获得优势地位,所以,无论国家之强与弱,合作共赢才是长久之道。合作共赢具有深厚的哲学意蕴。合作共赢,强调世界各国平等交往、有序参与、共同发展和分享收益,其目的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当前,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各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须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赢家通吃,而要义利兼顾,平衡各方利益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实际上,任何民族和国家都存在着一个能否和如何走出“民族中心主义”和“双重标准”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时代的主题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以“合作共赢”取代“零和博弈”,以“命运依存”取代“利益对抗”是大势所趋。在21世纪,迫切需要走出“我-你”的二元困境,走向“我们”的共同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知和对依附格局、主从结构、丛林秩序和零和规则的反思基础上,提出的一种超越国界、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的局限,突破意识形态范畴的新型全球治理理论。中国提出并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增添更多正能量。

总之,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谋求势力范围。历史证明,和平发展是中国基于自身国情、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作出的战略抉择,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中国根本利益,符合周边国家利益,符合世界各国利益,我们没有理由去改变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①。一句话,“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②

作者简介: 张艳涛,中共厦门大学委员会党校副校长,厦门大学池田大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地址: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邮编:** 361005

手机: 13400665480 **电子信箱:** zyt@xmu.edu.cn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67页。

^②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18-119页。